

唯物史观照鉴下的华夏哲思 ——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读《中国哲学简史》

库琳

(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, 陕西省西安市, 710048; 15091635188@163.com)

摘 要: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, 探讨两者的对话关系。从物质生产视域分析“道器之辨”, 指出儒、道、墨等学派的治国理念差异, 反映了春秋战国不同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诉求, 印证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原理; 从实践观维度剖析“知行之辨”, 比较中国哲学的道德践履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的异同; 从社会发展视角审视“古今之变”, 说明哲学形态转换是社会变革的反映, 传统哲学的民本理念、辩证思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基石, 强调需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传统哲学。

关键词: 《中国哲学简史》; 马克思主义; 唯物史观; 中国传统哲学;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

引言

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开篇即言: “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。”[1]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光亮照进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, 那些看似虚无的“道”“理”“气”, 猛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下显露出清晰的纹路, 这部归纳了三千年思想脉络的著作, 不单单是华夏智慧的谱系, 更变为两种哲学体系对话的平台—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、辩证法以及实践观, 为中国哲学解读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; 而儒家主张的民本理念、道家的辩证思维模式、墨家的实践态度, 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垫了深厚的文化基石, 这种突破时空的思想对话, 让我们察觉到传统哲学的历史局限, 更会发觉它跟现代唯物哲学相通的精神基因片段。

1. 物质生产视域下的“道器之辨”

冯友兰把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归纳为“内圣外王”, 也就是借助内心修养来实现对外在的治理, 这种好似唯心主义的表述, 处于马克思主义“物质决定意识”原理的框架下, 反映出受历史条件规制的真实面貌, 儒家宣扬“为政以德”理念, 道家秉持“无为而治”主张, 墨家主张推行“兼爱尚贤”, 这些治国理念显现出的差异, 实则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诉求——儒家代表着没落贵族的精神坚持, 道家映射出隐士阶层的生存智谋, 墨家展现出小生产者的朴素心愿。正如马克思在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序言》中指出的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”[2], 中国哲学各派别的“道”, 始终立足于特定历史阶段的“器”, 即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总体。

儒家“重义轻利”的价值理念常被批评是唯心主义倾向, 但要是置于铁器牛耕普遍普及的农耕文明的语境下, 就凸显出它的历史合理性, 冯友兰指出孔子周游列国其实是“为封建制度辩护”[1], 这种辩护其实是适应小农经济发展的伦理秩序站台——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等级观念, 事实上维护了农耕社会所需要的稳定模式。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言“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”的论断高度相符[2]; 儒家伦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, 既反映出封建经济基础的诉求, 又回头巩固了这种生产关系, 直至近代工业文明对中国发起冲击, “三纲五常”才因无法跟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被历史淘汰, 这恰是唯物史观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生动说明。

道家“道法自然”这一主张的辩证思维, 则蕴含着跟唯物辩证法相符的智慧, 冯友兰剖析《道德经》“反者道之动”的时候, 专门突出其“对立转化”的深刻特性[1], 这种认识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“矛盾论”有惊人的共鸣——二者都认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内部矛盾, 都认为要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本质。但差异也十分明显: 老子的“自然”是离开人的实践的抽象化存在形式, 马克思主义论及的“自然”乃是“人化

的自然”，即由人类实践活动所改造的客观世界，当庄子感慨地说出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时，他消除了人与自然实践上的关系；而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里面提出的“人化自然”，则强调借助劳动实践达成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[3]，这刚好是道家自然观缺失掉的历史维度。

2. 实践观维度中的“知行之辨”

冯友兰在书中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的“实践品格”，认为“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”[1]，即突出知识跟美德的统一，这种实践品格与马克思主义“实践是认识的基础”这一命题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，但两者“实践”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分：中国哲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道德践履活动，马克思主义提到的实践乃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。

墨家有关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的主张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契合度最高，冯友兰判定墨家“是功利主义者”[1]，其“兴天下之利”的口号，内含着聚焦物质利益的朴素唯物意识，墨子反对搞“繁饰礼乐”，赞同“节用”“节葬”，从本质上说，是为小生产者争夺物质利益；其“非攻”的思想主张，反映出战乱状态下底层民众对生产秩序的热望。这种把道德主张置于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维，与马克思主义“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，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”的观点十分契合，但墨家的实践观念始终拘泥于道德层面的“行”，未能达到改造社会制度的层面，这让其封建制度确立之后逐渐消失不见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“实践只有突破观念局限才能推动历史发展”的判断。

王阳明讲到的“知行合一”命题，按照冯友兰的观点是宋明理学的实践转向[1]，这种把认识跟行动统一的一种努力，与马克思主义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，但这两者的认识论基础差异明显：王阳明的“知”体现为先天良知的显露，马克思主义的“知”乃是对客观规律的映照；阳明认为“行”就是道德修养的功夫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“行”就是“革命的实践”。冯友兰认为阳明心学“可谓主观唯心主义”[1]，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而言，该判断尤为准确——当“心外无物”将认识来源归结为内心，而非外部世界时，其实践观势必陷入“内省”的困境，无法切实做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。

王夫之的“知行相资以为用”表现出往唯物实践观接近的情形，这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强调“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”，把实践摆在认识的优先排序，这与马克思主义“实践高于理论认识，原因是它既具有普遍性品格，又具有直接现实性品格”的观点达成共鸣。冯友兰虽未明确地指出这种关联，但他肯定王夫之“属于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集大成者”[1]，该评价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范畴内深化——王夫之的思想证明了，中国哲学内部早就孕育着冲破唯心主义禁锢、步入唯物实践观的可能性。

3.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“古今之变”

冯友兰按照“子学时代”与“经学时代”划分中国哲学发展阶段[1]，这种分期样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方法相暗合——不同哲学形态的转换，从根本上看，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反映，从春秋战国产生的“百家争鸣”到汉代采用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看上去是思想主导权的更替，其实是封建制度从确立过渡到巩固的必然要求；宋明理学步入兴起阶段，对应着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后对伦理秩序的重新编排；近代西学东渐期间诞生的“新学”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后思想领域的必然呼应。这完全与马克思主义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”的基本原理相符[2]。

儒家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互关系，促成了饱含张力的思想对话，冯友兰道出“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‘仁政’”[1]，孟子提出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主张，蕴藏着重视百姓力量的合理成分，但这种民本思想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着根本性的区别：前者把人民当作统治的对象，后者把人民认定为历史的主体；前者期盼“为民做主”的贤俊政治，后者主张采用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民主制度。这种差异在冯友兰探究黄宗羲思想时体现得尤为明显——黄宗羲虽批判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，但其所采用的解决方案仍是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”，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范畴，这其实就是缺少唯物史观指引的历史局限性。

中国哲学含有的辩证思维逻辑，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铺设了文化桥梁，冯友兰极为推崇《易经》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这一命题[1]，认为其蕴含着“宇宙里万事万物都在阴阳这两种相反又相互促成的力量中发展变化”的深刻智慧，这种辩证思维同黑格尔辩证法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渊源不一样，却于“对立统一”“量变质变”“否定之否定”等规律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状况。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中对传统辩证思维实行创造性转化[4,5]，正是这种思想共鸣的范例——以“实事求是”阐释“格物致知”，靠“群众路线”推动“民为邦本”内涵深化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获得了独特表达样式与文化根基。

冯友兰的“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地位，历来跟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可以相抗衡”这一论断[1]，按照马克思主义视角获得新的意义，中国哲学为中华民族在特定物质生产条件里的精神创造体现，又蕴含着超

出时代的智慧精华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给出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手段——除掉其唯心主义的杂质，吸收其唯物辩证的合理要素；舍弃其封建伦理的糟粕，发扬其着眼现实、重视实践的良好传统，就这个层面而言，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不只讲着过去的思想故事 [1]，还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发展指引方向——只有紧紧扎根于民族哲学的土壤，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闪耀出更明亮的真理光辉。

4. 结论

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所呈现的中国传统哲学 [1]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、实践观与辩证法的映照下，展现出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局限。从物质生产视角看，儒家、道家、墨家等学派的“道”均植根于特定历史阶段的“器”，印证了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规律 [2]；从实践维度而言，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虽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存在本质差异（前者侧重道德践履，后者强调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），但墨家的功利倾向、王夫之的“知行相资”等思想已显现出向唯物实践观靠近的趋势；从社会发展角度，哲学形态的“古今之变”实为社会存在变革的反映，而传统哲学中的民本理念、辩证思维等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石。

综上，中国传统哲学需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，剔除唯心主义杂质与封建糟粕，吸收唯物辩证精华与实践传统，才能使其智慧基因在当代焕发生机，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土壤、实现本土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冯友兰.《中国哲学简史》[M]. 涂又光,译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3.
- [2] 马克思.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序言 [M]//马克思恩格斯选集(第2卷)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2: 3-5.
- [3] 马克思.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[M]//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第42卷)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2: 95-132.
- [4] 毛泽东.《矛盾论》[M]//《毛泽东选集》(第1卷)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1991: 299-340.
- [5] 毛泽东.《实践论》[M]//《毛泽东选集》(第1卷)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1991: 282-298.